



贺绍俊 / 著

文学的尊严

中国书籍文学馆

名家文存



在这个物质突然变得特别丰富的年代，
人们往往忽略精神的追求而陷入空虚和迷茫，
因此更需要文学以理想主义的灯火去照亮人们的精神空间。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014042085

1267.1

1695

中国书籍文学馆

名家文存

文学的尊享

王平题



1267.1

1695



北航

C1731183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280508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的尊严 / 贺绍俊著.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 2014.3

(中国书籍文学馆·名家文存)

ISBN 978-7-5068-3945-7

I . ①文… II . ①贺…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6193 号

文学的尊严

贺绍俊 著

图书策划 武 炳 崔付建

责任编辑 李国永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945-7

定 价 32.80 元

目 录

说理篇

- 002 经典化与当代文学
- 009 高原状态与文学缺氧
- 011 文学的，还是媒体的？
- 014 坚硬的现实主义或者温和的批判
- 019 塑造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形象
- 023 汉语危机与新世纪文学的可能性
- 027 文学冷还是出版冷？
- 031 人民性是一个让我们审慎对待的词
- 035 文学的理想精神让我们更有尊严
- 039 闭门造车为何大行其道？
- 042 心灵体验的能力
- 045 寻找异质的文化内容
- 049 资源共享与延宕中的世界性
- 054 从工业题材到都市文学
- 059 文风四题

知人篇

- 070 柏杨：永远在野的政治家
- 073 周政保：一位捍卫文学尊严的军人批评家
- 075 林那北北北：一体两面
- 094 鲁敏：离圣洁更近一些
- 099 罗伟章：吟唱苦涩沉重的教育诗
- 106 郑小驴：远离时尚元素的“80后”
- 110 用头脑行走的史铁生
- 113 天高云淡的意境里阅读郭文斌
- 119 清洁的东君
- 124 劳马的哲学小说
- 131 周瑄璞的城市生活形态小说
- 137 葛水平印象：暖暖地气中的灵性
- 143 我读畀愚：迷蒙柔性的反讽以及哲学家的品格
- 146 麦家的密码意象和密码思维
- 153 麦买提明·吾守尔告诉我们：
每一个维吾尔人都是阿凡提
- 156 “文学湘军五少将”的硬汉精神

品文篇

- 164 隐喻的私生女
168 这棵巍峨的大树依然郁郁葱葱
171 中国古代战争的《史记》
174 向生命伦理中的善良和美好致意
178 盲人形象的正常性及其意义
187 一段被湮没的现代化
192 传统女性的最后葬礼
196 沉默是诗歌对抗现实的一种方式
199 超越天使与妖女的“奇观”
203 改革时代的大赋体
207 革命化的个人史
210 不变的“仙人洞”有着无限风光
215 “走出去”的文化感悟
219 孤傲的唯美写作
222 你在做一项“伟大的启蒙”
227 用伟大的文学想象激活历史
231 缅怀诗歌的时代
236 流浪的灵魂是高贵的
240 点评“70后”

“我常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父亲，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坏父亲。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好父亲，因为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好父亲。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坏父亲，因为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坏父亲。”这是《我常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父亲》一文的开头，也是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文章通过对比，表达了作者对父亲的爱与感激之情。文章首先从“我常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父亲”入手，通过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以及对父亲的评价，说明了“我常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父亲”的原因。接着，文章通过对比，说明了“我常觉得我是一个好父亲”的原因。通过对比，文章揭示了“我常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父亲”和“我常觉得我是一个好父亲”之间的矛盾，从而突显了“我常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父亲”的中心思想。

经典化与当代文学

经典是一个伟大的字眼。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的精神文明史就是经不断孕育、锻造经典的历史。因此离开了经典，也就离开了精神文明。一个人若是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唯一的方式就是走进经典。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所论述的“全面发展的人”，他不仅有健康的体魄，有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本领，还必须要有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既要学习生活经验，也要学习知识和技术，而特别需要学习的，是人类几千年文明积累起来的经典；经典是构筑我们精神世界的基本材料。但什么是经典，却是一个永远吸引着人们也似乎永远无法获得一个公认结论的话题，值得我们无休止地讨论下去，也正因为我们在无休止地谈论它，我们就会始终保持着一种对经典的期待。然而当下的社会似乎是一个不利于经典生存的时代。

经典是高峰，但也不是孤独的存在；经典是伟大的，但也不是伟大的终结。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卡尔维诺，也是一位对当代中国颇有影响的经典作家，他写过一篇文章：《为什么读经典》。他首先认为，经典作品是那

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还不仅仅是“重读”。卡尔维诺进一步解释：其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其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卡尔维诺接着非常具体地表达了他对经典的定义。他说，如果我读《奥德赛》，我是在读荷马的文本，但我也不能忘记尤利西斯的历险在几个世纪以来所意味的一切事情，而我不能不怀疑这些意味空间是隐含于原著文本中，还是后来逐渐增添、变形或扩充的。如果我读卡夫卡，我就会一边认可一边抗拒“卡夫卡式的”这个形容词的合法性，因为我们老是听见它被用于指称可以说任何事情。如果我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我就不能不思索这些书中的人物是如何继续一路转世投胎，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从卡尔维诺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有明确的经典坐标，同时他又强调经典的影响。

所以，经典是一株仍然在生长的大树，一株仍然郁郁葱葱的绿色的大树，它不断地结出大树的种子，聪明的人在这株大树下会摘下一粒种子，栽种在自己的园地里，让它又长出一株新树来。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是因为我们看重经典这株树上的种子。请注意，经典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是必须遵守的法规，也不是供人描红的字帖。

经典是可以在文明发展、文学发展进程中不断被丰富被深化的文本。从这个角度说，我很欣赏“经典坐标”的提法，但我更加关注的是，经典坐标的动态性而不是静止性，由此，我更愿意提到另一个词：经典化。经典是经典化过程的结晶，同时，经典也意味着它包含了一种经典化的运动，一旦这个经典化运动终止了，经典也就死去了。

当代文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经典化过程具有更大的未知数和不确定性。事实上，应该把作家的创作、批评家的批评，以及整个社会的文

学生产和文学消费，都看成是经典化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元素。

具有经典化意识，并非就是唱赞歌、说好话。它必须是一种独立的学术思考，它会生成出不同的意见。当然，一个独立的学者认准了自己所判断的经典时，也会毫不吝啬赞扬的话、肯定的话。要有这样的慧眼识英雄，否则经典将将会被埋没。张爱玲现在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之一了，她的经典过程比较复杂。当然，当年她在被日本人侵占的上海，曾经是风头正健的文学新人，但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她逐渐退出文坛的中心，以后在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史建构中她几乎销声匿迹，只是在台湾的文学史叙述中还保留着她的身影。1961年，美国的汉学家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辟专章讨论张爱玲，给她极高的评价，认为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直到将近二十年后，夏志清的这部著作引进到中国内地，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带来观念上的冲击，从此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遽然上升，并成为越来越获得公认的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但我以为其实张爱玲当年在上海开始文学写作起，其经典化过程也同时就启动了，在其经典化过程中，有一位伟大的评论家就发现了张爱玲的文学价值，这位评论家就是傅雷。我们一直把傅雷视为一位优秀的翻译家，事实上，他能将外国小说翻译得那么精彩，就在于他具有一流的文学鉴赏能力，因此他也是一位文学评论的天才，只不过他未将文学评论作为自己的主业。当年他在上海读到张爱玲的小说后，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他从张爱玲的小说中发现了特别的价值，他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因为过分强调小说的思想意义，从而形成了一种“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他从张爱玲的小说中发现，张爱玲并没有受到这种鄙夷技巧的文学态度的影响，因此他满腔热情地赞美张爱玲的小

说《金锁记》“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格，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傅雷在这篇评论中详细分析了《金锁记》在结构、节奏、色彩上的匠心，以及作者的心理分析等方面的巧妙运用。傅雷除了肯定了《金锁记》的艺术性，还对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连环套》等小说提出了批评。傅雷在文章最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这其实是傅雷用委婉的方式向张爱玲提出的忠告，他把张爱玲看成是一个“奇迹”，同时他又期待张爱玲不要成为没有好收场的“奇迹”。张爱玲读到了这篇评论，她写了一篇谈创作的文章，含蓄地回应了傅雷的批评，既有辩解，也有自我批评。我相信，傅雷这篇适时的评论对张爱玲的文学经典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没有傅雷的评论，也就没有后来夏志清的重新发现。夏志清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对《金锁记》的分析，或许就有傅雷给予的启发，夏志清称赞《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出色的中篇小说”，这完全就是断定了《金锁记》的经典意义。

描述张爱玲的经典化过程，是想强调文学批评在经典化过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我在这里是强调当代文学的经典化。

在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中，一直弥漫着一种非经典化、去经典的思潮，人们对于当代文学，热衷于做的就是摧毁和破坏，从来不认为建构当代文学的经典是当代人应当做的事情。我在大学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对这一点感触尤其深。依我的看法，人们到大学来学习，首先就是要学习经典。当代文学专业就应该学习当代文学的经典。否定经典的社会时尚对当代文学的冲击最大。那些学习期间的必读作品一个个被宣布不是经典了，这也真让我们教当代文学的老师惶惑不安。经典都不存在了，我们还有必要在大学里设置当代文学专业吗？当然，经典化过程本身就包含着质疑与否定，有些文本一度被认定为经典，但在岁月的淘洗下最终被证明还没有经典的

含量，自然就要被淘汰出局。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时代下走过来的，经典化过程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太大，特别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将左右经典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在因素逐渐衰落，真正的经典也许才会水落石出。也就是说，经典始终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之中，在“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中一再地确认自己的身份。所以基洛里在为《文学研究批评术语》撰写“经典”条目时，也特别强调了经典的动态性，他写道，经典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经典中不断有作品添加进来，与此同时，其他的作品又不断地被抽去”。但是，必须承认，经典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是与非经典化和去经典化完全属于两种思维方式，不应该混为一谈。尽管当下的非经典化和去经典化的思潮带有对过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左右经典化的历史的一种反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完全认同非经典化和去经典化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和方法来进行文学批评。

我以为，文学批评家不仅要有经典意识，而且也要有经典化意识。文学批评最根本的功能就是制造经典。文学批评的过程就是经典化的过程。也是从这个角度说，我很钦佩宁波大学设立艾伟工作室的举动。我以为这是一种积极、主动参与到经典化过程中去的举动。

在当下，文学批评仿佛成为了一个最污浊的词语，一方面，文学批评家不好好呵护它，他们用自己的不负责任的批评行为给这个词语涂抹上污浊的色彩；另一方面，文学批评越来越成为媒体时代的贱儿，它可以随意地“被”丑化、“被”辱骂、“被”作为一些社会问题的遁词。所以在当下的文坛，作家是最看不起批评家的，你要去问作家，你读了评论你的作品的文章没有，十个作家有八个会以一副不屑的神气对你说：“我从来不读评论文章的。”但我猜想，作家们从内心来说，仍然是希望从文学批评中获得灵感的，他们不过是因为当下的文学批评变得非常世俗，他们想以拒斥的态度表示他们与这种世俗化的批评划清了界线，以显其仍保持着清高。以

我有限的了解，我觉得大多数的作家私下里还是很认真地对待文学批评的。我记得有一年在福建参加一次文学研讨会，会上既有文学批评家，也有作家。李建军发言时尖锐批评了莫言，莫言就在会场上，针对李建军的发言他也进行了反批评，关于这场争论的具体内容不去说它，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后来引起媒体的极大兴趣。有的记者也以此问莫言如何看待李建军对他的批评。莫言说：“我更多的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反思自己。首先，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写作了二十多年，已经五十多岁的人，在听到批评，哪怕是尖刻的批评的时候，还是应该保持一种冷静的心态。批评家对我的作品的艺术方面的批评我可以争辩，我有反批评的自由；至于涉及到人格和道德方面的批评，这个就没有必要辩解，更没有必要反诘，而是应该反思，应该警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应该保持这么一种心态。”“这场争论让我非常冷静地考虑了自己今后应该以怎样一种真实的、不虚伪的态度来对待批评，应该用善意去想批评家，不要把别人的意图往坏里想。不管问题提得多么尖刻，不管批评多么粗暴，都应该从善处去想，都应该从自身来找问题。”在这里，我既欣赏李建军的直率的批评，尽管当时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一些观点；同时也欣赏莫言对待否定性批评的宽容姿态。事实上，一个作家与一个批评家的关系如何并不重要，他们之间也许是朋友关系，也许是“敌我”关系；也许是和气一团，也许是剑拔弩张。但关键是整个社会的批评生态应该是健康良好的，是有序循环的。只有在这样一种良好的批评生态中，各种声音都能够被容纳下来，都能够转化为一种经典化的努力。现在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良好的文学生态环境。

20世纪被韦勒克称之为“批评的时代”。20世纪的确也是文学批评特别风光的世纪。从马克思主义学派、新批评、精神分析学派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一批又一批的批评团体纷至沓来，声势逼人。而20世纪以来现代主义的文学经典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占据历史舞台，大放异彩，完全盖过了古典文学经典的风头，就因为20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在

经典化过程中的积极自觉的行动。更有必要指出来的是，文学批评不仅为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的生成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让批评自身生成了现代主义的思想经典。在今天这样一个娱乐化的时代，文学批评的风光不再，但“批评的时代”余韵尚在，文学批评应该在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有所作为。

文学创作的高原状态，是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相当高，却缺乏凌空突起的山峰。当我们回望 2005 年时，这种高原的印象似乎更为强烈。我们见到了很多熟悉的作家，他们仍然出手不凡，你可以说他们又有了新的进步，但他们并没有立起一座让我们仰止的高山。我们也见到了不少新的作家，他们的文字显得那么的成熟，他们的感觉又是那么的新鲜，尽管你能挑剔地说在他们的叙述里能发现一些大师名家的影子，你却不能不承认稚嫩与他们远不搭界；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成为横空出世的天才傲立苍穹。高原状态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学素质处在较高的水准，但文学高原的海拔高度只是通

高原状态与文学缺氧

文学创作的高原状态，是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相当高，却缺乏凌空突起的山峰。当我们回望 2005 年时，这种高原的印象似乎更为强烈。我们见到了很多熟悉的作家，他们仍然出手不凡，你可以说他们又有了新的进步，但他们并没有立起一座让我们仰止的高山。我们也见到了不少新的作家，他们的文字显得那么的成熟，他们的感觉又是那么的新鲜，尽管你能挑剔地说在他们的叙述里能发现一些大师名家的影子，你却不能不承认稚嫩与他们远不搭界；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成为横空出世的天才傲立苍穹。高原状态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学素质处在较高的水准，但文学高原的海拔高度只是通

在一年一度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上，几位作家推出新的长篇小说，如铁凝的《笨花》、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莫言的《生死疲劳》，成为文学的亮点。我还注意到有四五家出版社同时推出年度文学年选，都能成为受市场欢迎的图书。翻阅这些文学年选，的确感觉到每年仍有一批质量上乘的作品。文学的繁荣也许是空前的。

我以为中国当代小说这些年来始终处在高原的状态之中。所谓高原状态，是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相当高，却缺乏凌空突起的山峰。当我们回望 2005 年时，这种高原的印象似乎更为强烈。我们见到了很多熟悉的作家，他们仍然出手不凡，你可以说他们又有了新的进步，但他们并没有立起一座让我们仰止的高山。我们也见到了不少新的作家，他们的文字显得那么的成熟，他们的感觉又是那么的新鲜，尽管你能挑剔地说在他们的叙述里能发现一些大师名家的影子，你却不能不承认稚嫩与他们远不搭界；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成为横空出世的天才傲立苍穹。高原状态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学素质处在较高的水准，但文学高原的海拔高度只是通

过历史的对比才显现出来的，而处在高原中的当代读者并不会在历史对比中进行阅读，因此他们更在意高原景象带来的单调和平庸。平庸就成了我们批评当代文学的一个常用词。当然如果仅仅是有些平庸也许还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因为眼下的平庸毕竟是一种高水平的平庸。问题是如果我们的作家没有足够的实力，恐怕会连这样的平庸都保持不下去，会被高原的环境拖垮。种种文学迹象也显示出作家们在高原状态下有些筋疲力尽了。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作家的重复，不仅在重复古人、重复洋人，也在重复自己。重复自己在一些有所成就有所影响的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严重。我们从他们当下的写作中往往能找到他们多年前甚至十多年前的影子。重复是维持高原现状的最便捷的方式，因为今天的文学海拔正是前人的成就反复垒积起来的，你从已有的成果里搬用一点资源，就能保持一定的水平。但重复又是最懒惰的方式，它不可能使你垒起自己的高山。

重复的反义词就是创新。我相信每一个作家并不是不想创新，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学缺氧，文学缺氧了，还有什么精力去创新呢？初次到青藏高原的人多半都有高原反应，这是因为高原空气相对稀薄，那些高原反应严重的人不得不从氧气袋内吸几口新鲜的氧气。今天的作家显露出疲乏的神态，大概也是因为他们的文学缺氧了吧。当我们的文学游走在高原上时，我们的思想却应该设法潜入到底层，到底层去呼吸最新鲜的氧气。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一个开创性的世纪，前辈作家从无到有，为我们耸立起新文学的巍巍高峰。二十一世纪则需要我们的作家在高原上来一次新的造山运动，这实在是一场充满诱惑力的挑战。

文学的，还是媒体的？

文学的，还是媒体的？

今年的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得主、美籍澳大利亚作家杰拉尔丁·布鲁克斯来到中国访问，这也许算不得是多大的新闻，但这位获奖作家在中国短短的行程里却安排了很多项与媒体有关的活动，其中有一项就是应《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的邀请，到该杂志社做客并与几位中国女作家交流对话。我以为这倒是这桩新闻事件中的焦点。

据我所知，美国的普利策奖包括新闻和文艺两大类，而最有影响的还是新闻类奖项，其创始人是美国的一位著名的报业人士。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显然在普利策先生的心目中，新闻媒体与文学艺术（主要还是文学，创始人最初确定的奖项也只包括新闻和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中国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足以证明这一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传媒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一同诞生于中国近代以后的现代化运动中。现代文学的许多流派、许多理论主张，都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催生的，许多重要作家、经典作品也是由媒体一手锻造出来的。事实证明，也只有新兴的现代传媒，才能容得下不同于旧文学范式的现代文学。时至今日，传媒可以